

评论《水浒》反修防修

宁夏人民出版社

07.41

毛主席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都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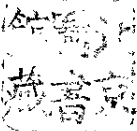
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B67-100

目 录

157

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	(1)
评投降派宋江.....	(9)
宋江和高像是“一丘之貉”.....	(20)
投降派的丑恶嘴脸.....	(28)
《水浒》与宋代的阶级斗争.....	(36)
评《水浒》的投降主义路线.....	(42)
忠实的奴才 可耻的叛徒.....	(50)
宣扬投降是对农民革命的歪曲.....	(57)
《水浒》为何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	(62)
评金圣叹腰斩《水浒》.....	(65)
金圣叹为什么砍《水浒》.....	(75)
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不可多得反面教材.....	(82)
《水浒》的版本简介.....	(106)



452957

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

——评《水浒》中的宋江

雅 林

《水浒》中的宋江，是农民起义的英雄，还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这是重大的原则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维护封建统治 反对农民革命

北宋末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人民不堪忍受，揭竿而起，“犯上作乱”，到处点燃起反抗的烈火。革命，用暴力反抗封建王朝的黑暗统治，是被压迫人民选择的唯一正确道路。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阶级生死搏斗的同时，统治阶级内部这一派和那一派之间，当权集团和非当权集团之间的矛盾也更加深化了。我们要全面深刻地解剖《水浒》中的宋江，就要看他对这个时代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什么态度，要看他是拥护农民革命，反抗封建统治，还是反对农民革命，维护封建统治。

宋江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自幼学儒”，“长而通吏”，脑子里浸透了儒家反动思想，学会了一套维护封建统治的权术。他怀着一片“报国”的忠心，时时想着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得遂“凌云志”。但是，当权既得利益集团“非亲不用”，使宋江这个下层小吏很难爬上较高的职位，挤进当权集团的行列。不仅如此，在统治阶级内部大狗小狗、饱狗饿狗的争斗中，象宋江这类不“当道”的地主阶级分子，还时时有被咬死咬伤的可能。因此，一心往上爬的宋江，事先营就了“狡兔三窟”：一是准备了藏身洞；二是“教爹娘告了忤逆”，免得犯罪时牵连全家；三是安排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逃跑去处。宋江对自己的地位十分不满。尽管他善于“忍受”，但也免不了时常发泄牢骚。一次，他劝武松道：如得朝廷招安，便可投降，“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些用来勉励武松的话，正是他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接着，他怅然地说：“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一下子就暴露出他的忠而见疏、怀才不遇的怨恨心情。

宋江和当权集团的矛盾爆发，集中表现在吟“反诗”这个行动上。有人说：宋江的“反诗”，表明他决心反抗不合理的现实；从此，宋江开始了革命生涯。吟“反诗”表现了宋江什么样的思想状态？“反诗”到底反不反？

宋江自“杀惜”流落江湖后，命蹇事乖，不但没能“得进步”，反而成了囚犯，被“文了双颊”，刺配江州。他独自一人，登楼饮酒，眼前的美景和自己的处境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时他心里想的是：“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这里”。为封建王朝效命的忠心不但不被赏

识，反而成了个被充军的囚犯，使这个以“猛虎”自喻的宋江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在“不觉沉醉”中，无限心事“蓦上心来”，借酒醉吟诗，把这种心情直接表露出来了。在这里，他根本不是要反抗封建王朝，而是发泄了自己对“当道”的“贼臣”的不满。趋炎附势的“刁钻之徒”黄文炳，把这两首诗说成“反诗”，是因为他一心想通过抱当权集团的大腿，“引荐出职，再欲作官”。他抓住了宋江的把柄，当然要利用这个机会，去报功领赏了。宋江对黄文炳把他的诗定为“反诗”并不认账，他十分委屈，万分恼火。大闹江州之后，他还向梁山起义军头领一再不厌其烦地解释，那是“一时间酒后狂言”，并无反意。可见，宋江的“反诗”并不反，宋江也并不是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

宋江平时装出一副“爱人”的面孔，惯施小恩小惠，经常给这人买一副棺材板，给那人一点药钱。他的这一套本来是为了笼络人心，掩盖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的，所以当农民拿起武器造反时，他的反动立场就立刻暴露无遗。当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夺了要送给蔡京的“不义之财”后，他出于朋友的私情救了晁盖，但对晁盖等的革命行动却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犯了“迷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晁盖等人以梁山泊为根据地，抗拒官兵，不断发展革命事业，他更视为大逆不道。他生怕受到梁山的牵连，所以“杀惜”后出逃，也不去梁山，而去投奔其他地主庄园。大闹清风寨后，宋江闯了大祸，曾“乘兴”投奔梁山。途中收到一封家书，使宋江立刻“迷途知返”，他大哭大闹，骂自己“不孝逆子，作下非为”，没有一点犹豫，连夜开了小差，回到了地主阶级的怀抱。回到家里遭到追捕，他表示宁可吃官司也不上梁山。他污

蔑农民起义军是专门“杀人放火”的洪水猛兽，“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他宁可当“囚徒”，不愿当“匪徒”。在充军去江州的路上，他故意绕过梁山，恐怕被山上的人遇见拉去入伙。当梁山起义军请他上山入伙时，他以死相威胁，甚至连枷也不开，怕坏了“国家法度”。他说：“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看，他仇恨农民革命的反动立场何等顽固！

宋江和一切政治骗子一样，表面上堂堂正正，信誓旦旦，实际上是个贪生怕死的可怜虫。他甘心充军，不去梁山，是因为“朝廷册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书”，不去躲藏也没有掉脑袋的危险。在浔阳江头，当真的遇到脑袋搬家的危险时，他呼天叫地：“早知如此的苦，权且在梁山泊也罢。”后来，梁山起义军把他从刀口下救出，大闹了江州。此时，虽然他仇恨农民革命的思想丝毫没有变，但是再也混不下去了，“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宋江最后被逼上梁山，是由于往上爬的希望破灭了，连性命也保不住了，不得已，改换门庭，另搞一场政治投机，这哪思说得上是什么“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呢？

篡夺领导权 推行投降路线

宋江上梁山后起了什么作用？有些评论说什么：宋江上梁山后，作了一系列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只因宋江上梁山，才有了“山寨的十分兴旺”，才使全军上下团结一致，等等。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要正确地评论宋江，最根本的就是要看他上梁

山后推行了一条对哪个阶级有利，为哪个阶级服务的路线，是搞革命还是搞投降。离开了路线这个纲，就丢掉了分析宋江形象的根本标准。

在农民革命领袖晁盖掌权的一段时间里，梁山泊上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占主导地位。成千上万被压迫群众“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积极参加起义队伍，打击封建统治者。广大群众在同封建统治阶级斗争中发挥了历史主动性，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宋江的上梁山，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通过封建仕途往上爬的路被堵死了，他就想混进革命队伍中找出路，用这种投机办法达到“尽忠报国”的目的。因此，上梁山以后，他就极力推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他利用各种时机大造投降主义的舆论：“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宋江等替天行道，并无异心”。为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他还要阴谋搞诡计，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为借口，限制晁盖的行动，把晁盖架空，自己把实权抓到手。晁盖死后，宋江坐了“第一把椅子”，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把“聚义”改成“忠义”，一字之差，把晁盖的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变成了以孔孟思想为基础的投降主义路线。他还通过“对天盟誓”，向起义军强行灌输“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的思想，把投降主义路线强加到梁山农民起义军的头上。

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组织路线从来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宋江为了推行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极力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拚命网罗朝廷命官、富豪将吏，改变农民起义军领导班

子的成分，构成投降主义路线的组织基础。宋江的这个反动目的，在千方百计拉卢俊义上山这件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卢俊义是河北有名的反动大地主，对农民革命有不共戴天之仇，他疯狂地叫嚷，要使梁山起义军“人人皆死，个个不留”，说什么：“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就是这样一个与农民起义军势不两立的反动地主分子，宋江却极为欣赏，看中了他“生于富贵之家”，有“贵人之相”、“豪杰之誉”的身份地位，不惜动用全山寨人马，拚死拚活地拉他上山。“只为一入归水浒，致令百姓受兵戈”。上山后，又再三再四要让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以使“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只是在其他头领的坚决反对下，才叫卢俊义“坐了第二把交椅”。相反，宋江对农民起义军内部的革命派，却百般压制，排斥打击。当李逵在菊花会上坚决反对招安，一脚把桌子踢翻时，宋江登时大怒，几乎砍了李逵的脑袋。他实际上是在起义军内部搞分裂。他要团结并依靠的只是那些一心跟着他走的投降派，哪里有什么“全军上下团结一致”？！

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当革命形势发展到高潮，梁山起义军对封建王朝形成严重威胁之时，也正是宋江叛卖革命成熟之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宋王朝对梁山起义军武力镇压政策的失败，迫使封建统治者不得不更换策略，朝廷内部“招抚”政策逐渐占了上风，这就使宋江的叛卖活动具备了外部条件。从起义军内部看，由于宋江

的苦心经营，投降主义路线已经处于统治地位，起义军领导班子内部已经形成了“朝廷命官过半”的局面，宋江已经牢固控制了领导权。当一百零八将全部上山，梁山农民起义军力量达到全盛时期的时候，他便在“大聚义”后的“菊花会”上，迫不及待地发表了政策声明：“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为了尽快取得朝廷的招安，宋江干尽了一切卑鄙无耻的勾当。他带人下山到东京，走皇帝宠妓李师师的后门，打通“枕头上关节”。又用重金贿赂朝臣，把“衷情达知今上”。当起义军活捉高俅后，宋江亲自把这个梁山的死对头扶上正座，纳头便拜，要他在皇帝面前说情，早日招安。更有甚者，他还直接向朝廷献策：“若以善言抚恤，我等尽忠报国，万死无怨”，示意皇帝要用儒家“仁政”、“恕道”来欺骗起义军。至此，宋江已经完全和朝廷当权集团同流合污了，在宋江的“山呼万岁，再拜谢恩”声中，起义军终于受了招安。招安后，宋江还十分恶毒地搞了个“梁山泊分金大买市”，把农民起义军多年积累的财富拍卖一空，使梁山起义军再无重新起事的可能。一场气壮山河的农民革命斗争，一个本来“十分兴旺”的农民起义“山寨”，终于被封建统治者通过宋江的手，不费一兵一卒就扼杀掉了。宋江又把“顺天”“护国”四个字写上了起义军的战旗，“强盗”变成了“官军”。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他双手沾满了农民革命的鲜血。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宋江是混入农民革命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理人，是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他在革命队伍中干了一系列坏事，干了封建统

治阶级想干而干不成的事。他对农民革命不是有功，而是有罪，罪大恶极！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中宋江这个投降派，对于我们今天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大量评论文章和近两年的一些评论文章，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鲁迅关于《水浒》的论述，散布了不少阶级调和论，美化、歌颂《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为宋江这个投降派做了种种辩护。一个基本论点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农民的局限性”。这些评论文章，不是把宋江说成“英雄”、“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就是用所谓“矛盾的性格”来掩盖宋江搞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这些错误观点，必须加以澄清。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评论《水浒》这部书，充分利用这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充分发挥宋江这个反面教员的作用，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

评投降派宋江

安群

宋江是《水浒》作者全力歌颂的主要人物。这种歌颂应不应该？宋江究竟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以往的评论很不一致。毛主席最近指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从路线上划清革命派和投降派的界限，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并回答人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水浒》所描写的时代是北宋末年。这时，宋王朝的统治日益腐朽，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异常尖锐。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围绕着是起义还是投降，在梁山农民起义军中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宋江从开始反对晁盖起义，主张投降，到接受招安，去打方腊，一直到最后毒死李逵，所推行的完全是一条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他是一个坚持奴才立场到底的投降派。

有人曾根据宋江放晁盖这件事，把宋江说成梁山革命事业的“奠基人”，似乎没有他，就不会有梁山农民起义。这种看

法是受了作者美化宋江搞修正主义的影响。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晁盖领导的黄泥岗暴动，才是梁山农民起义的真正开始。在此之前，小说所描写的只能看作是故事的铺垫，是梁山农民起义的背景。有了这次暴动，才有晁盖等人的上山；有了晁盖等人的上山，才有梁山农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王伦占据梁山，只是“打家劫舍”。晁盖作了寨主，才有“共聚大义”的纲领和路线，梁山才成为各路起义英雄众望所归的根据地。所以，梁山事业的奠基人是晁盖而不是宋江。宋江放晁盖，只是叫晁盖离家避难，同时也使自己落个“仗义”的好名声，扩大自己在江湖上的影响；决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叫晁盖上山造反。这从宋江对待晁盖“劫取”生辰纲、带领起义队伍上梁山的态度看得很清楚。“劫取”生辰纲不义之财，宋江认为是“犯了迷天大罪”；擒何涛，俘黄安，杀官兵，坚持武装对抗，宋江认为这都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可见他对晁盖聚众起义，压根儿就是反对的。所以，宋江极力要和梁山切断联系，宁愿自首吃官司，刺配江州，也不愿上梁山。这样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怎么能说成是梁山事业的“奠基人”！

宋江上了梁山，作了头领，是否就由不革命转向革命了呢？没有。他混进梁山革命队伍后，充当了地主阶级的代理人，继续经营他的反革命事业。晁盖一死，宋江立即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厅是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坚持农民起义路线的象征。宋江这一改，标志着梁山路线的根本改变，灭了革命派的志气，长了投降派的威风。这个改变，是宋江搞修正主义的摊牌。如果说，晁盖在世时，宋江还有所顾忌，主要在暗地里培植党羽，进行破坏；那么，晁盖一死，宋江就明目张

胆地亮出他那修正主义的招牌，公开“修正”晁盖的起义路线，强迫梁山农民起义军实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从此，这支革命的队伍也就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毁灭的道路。

宋江处心积虑搞修正主义，究竟要“修正”什么呢？主要就是要把晁盖既反贪官，也反皇帝，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

“修正”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皇帝是地主阶级统治的总代表。因此，农民起义如果要向前发展，就决不会把自己的斗争只限制在反对几个贪官的范围内，而要发展到反对以皇帝为总代表的地主阶级的统治。尽管《水浒》的作者为了突出歌颂投降派宋江，有意少写或不写晁盖的革命思想和言行，但我们从书中只言片语还是可以看到，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是既反贪官也反皇帝的。晁盖上梁山之前，烧掉自己的庄院，武装抗拒官军的追捕，就表示了他背叛地主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义无反顾的决绝态度。他的绰号叫“托塔天王”。“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既要称王就不可能不反对皇帝。在晁盖的农民起义路线的指导下，朱贵喊出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李逵多次提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作者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凭借反革命的嗅觉，也看到晁盖坚持的农民起义路线是以反皇帝为核心的。因此，惟恐晁盖“托胆称王”，就让他“归天及早”；而让所谓“呼群保义”的宋江来“把寨为头”。这个“忠为君王恨贼臣”的投降派一为头，就把梁山农民起义的斗争限制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框子内，彻底“修正”了晁盖的起义路线，背叛了农民革命。

《水浒》为了宣扬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着重写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与高俅由于所处社会地位和政治遭遇的不同，在实现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野心和贪婪地掠夺人民财富上，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形成了地主阶级内部不同的两个派别。而他们在反对农民起义上又是一致的。如果说有不同和有矛盾的话，不过是一个钻到里面反，一个站在外面反；一个属于招安派，一个属于围剿派。正是由于宋江的混入，里外配合搞招安，才扑灭了梁山农民起义的烽火。他起到了高俅所不能起的作用。招安派和围剿派在本质上又是共同的。宋江不反皇帝，结果受招安，去打方腊。这时，他同高俅一样，又成了围剿派，抓住起义的农民，剖腹剜心，表现了他的地主阶级的极端残忍性。象宋江这类混在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叛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最后必然是不反贪官，不反皇帝，专反农民起义，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鹰犬。这是搞修正主义的必然结果。

二

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必然要在组织上闹分裂，破坏革命团结。宋江为了把梁山搞成投降派的山头，要尽阴谋诡计，排斥革命派，大搞招降纳叛。他是搞分裂主义的罪魁。

排斥晁盖。晁盖是梁山起义的领袖，宋江搞分裂主义，首先就把矛头针对晁盖。他借京师童谣这样的谰言谎言，把自己吹嘘成天命攸归的领袖人物，为篡权制造舆论。为了达到排斥

晁盖的目的，他玩尽了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每当梁山有重大的军事行动，宋江总是不让晁盖出马，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表面上是尊重，实际上是架空，叫晁盖成为徒具虚名的“空头司令”。而他自己带兵出征，俨然成了部队的最高统帅；得胜归来，又树起了自己的威信。他从篡夺军队指挥权入手，一步步地篡夺梁山的全部领导权。晁盖对宋江的篡权阴谋，逐步有所觉察，并进行了斗争。打曾头市，晁盖决定亲自出马，照例又受到宋江的阻挠。晁盖说：“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揭了宋江争功劳、捞资本的老底。晁盖的临终遗言，也否定了宋江作为当然的“梁山泊主”的资格。可惜为时已晚，宋江已经大权在握了。

贬低革命派。晁盖死了，投降的最大障碍排除了，但是李逵、吴用、三阮这些革命派不愿意投降。吴用是同晁盖一起起义的，对梁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宋江心里明白，如果让吴用掌握大权，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就难以得逞。所以他不惜一切，从千里之外把卢俊义这个对农民起义充满刻骨仇恨的大地主拉上山来，排在吴用之前，坐了第二把交椅。结果，忠义堂前升起了“山东呼保义”、“河北玉麒麟”两面白旗，标志着宋江为实现投降完成了领导核心的改组。

招纳和重用投降派。宋江为了扩大投降派的势力，大量招纳贵族豪绅、地主恶霸、朝廷军官，并把他们安插在梁山起义军的重要位置上，作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依靠力量，改变了起义军基本队伍的阶级成分。这些人或者是由于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受到排挤，暂依梁山而本性不改；或者是在被俘无奈的情况下，暂居水泊，等待招安。宋江把这些人纠集在一起，

就组成了以他为首的钻入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地主阶级别动队，随时都准备从堡垒内部把梁山革命根据地毁为瓦砾。这绝不是什麼“招贤纳士”，而是地地道道的“招降纳叛”。宋江自己就曾得意地宣称：“你看我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李逵的话一语破底：“山寨里都是你手下的人，护你的多”。这说明宋江为了实现投降主义路线，千方百计地拼凑成了投降派的班子，在组织上为受招安作好了准备。

有人曾经认为宋江这一切活动是为了“团结起义军”，这是离开了两条路线斗争看问题的结果。宋江为什么要梁山一百〇八人“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呢？是为了要大家死心塌地，听从他的摆布，服从他搞投降主义路线。投降派宋江要尽阴谋诡计，排斥革命派，篡夺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清楚地表明他不是什麼梁山上“团结”的旗帜，而是搞分裂主义的阴谋家、野心家。

三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基础。宋江搞投降主义，不是偶然的，是由他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决定的，是他所信奉和宣扬的孔孟之道的产物。

宋江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自幼学儒”，“曾攻经史”，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后虽混迹江湖，但“尽忠报国”，“青史留名”，仍然是他的“凌云志”。他上了梁山，手捧“天书”，满口“忠义”，一直是“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地主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没有丝毫的改变。

宋江这个儒家之徒所信奉的主要是宋代的反动理学。宋代